



知青文学：精神放逐的反思

——海南周刊对话著名知青作家郭小东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

郭小东：

国家一级作家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院长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会长、广州国际中华学术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。1992年被授予“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”称号、1994年被授予“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”称号、首届“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”。

迟迟不来。

40年知青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

海南周刊：知青文学在40年文学大潮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呢？

郭小东：一切结论都必须到历史状况中去寻找。40年来的知青文学，不管其最终的文学成就如何，在每个文学时段上，它都充当了主角。知青时期文学（“文革”10年期间），知青长篇小说有15部之多（《征途》、《分界线》、《铁旋风》、《山风》、《剑河浪》和《青春》等等），占当时长篇小说产量的一半以上，形成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。它以背离现实、虚张声势以及乌托邦叙事为主要特征，而这也正是那时的时代精神。虚拟与先验的文学元素装饰而成的故事、人物、情节与性格，至今读来仍令人忍俊不禁。它们的作者是知青中受宠于当时政治的圣人。

1980年代的知青文学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书写。

所谓记忆，是对曾经的生活现实消解与删除之后的结果，是一种体验的集体再现。在文学中，它以集体共名的角色表达群体的声音，以个体人物去展示和铺排史的效果。《伤痕》、《今夜有暴风雨》、《雪城》、《蹉跎岁月》、《本次列车终点》、《北极光》、《年轮》、《孽障》、《桑那高地》

的太阳》、《被囚的普罗米修斯》、《当代骑士》乃至后来的《黑骏马》、《北方的河》、《南方的岸》、《大林莽》、《世界》和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等等，1980年代知青文学饱浸着流放地的鲜血与污浊的腥气，以一种在此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神精神挣扎和灵魂呻吟，铺天盖地地扑向每一个人的心头。与其说人们在倾听文学，不如说是在呼唤时代的变革。

由198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承担建设起来的知青文学的整体悲剧风格，在1990年代迅速式微。王蒙的逃避崇高，刘再复的告别革命，对集体话语和宏大主题从理论上提出质疑；还有王朔的粗鄙与韩少功的寻根，方方和池莉等新写实主义的文学实践，文学迅速趋向多元。知青作家纷纷转向，张承志以笔为旗的宣言成了风中绝唱；梁晓声、史铁生的退守却顺应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势。他们或告别热情与悲壮，或以平和心态叙写人生秋天的丰饶和宽厚，前者是梁晓声的系列作品《九三漫忆》、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》等；后者是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、《命若琴弦》和《务虚笔记》等。

知青记忆书写的式微，也就是知青文学悲剧的式微。

1980年代的知青作家在1990年代的集体溃败，预示着新的文学形势的诞生。

在这种旷日持久的式微中，有一种现象却始终不衰，那就是遍地开花的各种知青回忆实录，这些出版物的数量几倍于正式出版的知青小说。它们作为一种压抑已久的民间声音，其状况更为复杂，是新时期知青文学的另一种立场、姿态和声音。

海南曾是广东当代文学的重镇

海南周刊：知青文学从社会转型初期的产物，到后期形成反思色彩浓厚的文学形式，他们的精神姿态和写作姿态应作怎样的认识？

郭小东：时至今日，知青文学在自身发展的40年间，已经提供

了足够的文学资讯。可以说，从李剑的《醉卧花丛》起始至今这20年间，在主流知青文学之外还有一条绵延不断的虚线，即李剑《醉卧花丛》、阿城《棋王》、刘醒龙《大树还小》、李洱《鬼子进村》和何顿《眺望人生》、王小波《黄金时代》、池莉《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》等。这些作品以一种反叛主流的另类叙述，呈现1980年代、1990年代至今知青文学的非主流倾向。这是对主流知青文学的惯常手势——成功者说的叙述特征的无情奚落，也是对青春无悔的全面颠覆。它们完全抛弃主流知青作家的文学观念、文本方式和写作手法，而以非知青视角的异度审视，边缘立场的重新确立，反讽的文学态度，以及对以往知青文学传统的坚决割裂与蔑视，向庸常和常识靠拢，以破碎的生存境遇和低俗的欲望观念，去对抗以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弊端——对“我”的消解，而以“大我”的共性经验去编织故事，以达到史的证明和结论的企图，从而把个体的人、独特方式的“人”字高悬于俗世之上。这是文学中人本主义精神的异度张扬。

海南周刊：在知青文学史上，海南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，曾经活跃着当时最优秀的知青作家，后来还成了一个作家包括知青作家的集结地，海南的知青文学是否应该得到高度评价，同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？

郭小东：其实，广东当代文学的重镇曾经是海南而不是广东本土。海南作为那个时代广东的“流放地”，曾于1950、1960、1970、1980年代，产生大量后来成为广东文学史上重要成就的作家作品。

海南是南方知青文学的圣地

海南周刊：如果笼统地概括知青运动，概括知青文学，这都容易造成一种平面化的理解，应该怎样跳出平面化，来看待海南知青文学的丰富性呢？

郭小东：海南，可以说是南方知青文学的圣地！一直想谈谈海南的知青文学，可始终找不到适合的时机，海南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。尽管她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知青上山下乡地区之一，曾经活跃着当时最优秀的知青作家，诸如广东的孔捷生、洪三泰、伊始、吕雷、郭玉山等等，后来还成了一个作家包括知青作家的集结地，如韩少功、晓剑、蒋子丹、陈剑晖和张新奇等，但是，海南的知青文学真的被遗忘，被文学史所忽略了。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最大的理由。多年来，文革与知青总是一对敏感的话题，尽管所有的中国人，都无法绕过这两个话题。所有的现实，包括时下在大张旗鼓地纪念与张扬的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重大事实，都与文革与知青记忆相关。没有极左的文革浩劫和知青运动，何来改革开放30年重大意义？没有闭关锁国的文革与文革前的岁月，又何来改革开放

30年重大发展？

海南周刊：如果从地域特征来看，海南知青文学的这个空间的分布活跃度是否很高？在文学史中可以是占有恒久的意义吗？

郭小东：今年是知青运动40周年纪念。五年小庆，十年大庆，这似乎已成传统。40年前，12月22日，毛泽东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……”的伟大号召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，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是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经后来公布的统计数字，最保守的估计，当时有1700万的初、高中毕业生，响应毛主席号召，到农村边疆去上山下乡。十年后的1979年，这1700万人以“大逃亡”的方式，陆陆续续返回城市，引发了城市与乡村的又一轮大震荡。



郭小东作品封面。(资料图片)



知青们在劳动之余自娱自乐。(资料图片)

海南周刊：从文艺美学上来看，知青文学的地位怎样？

郭小东：知青岁月，已经成为一种畸形的精神资源，孕育着不同年代的知青文学。

20世纪60、70年代，80年代，90年代，21世纪，这四个年代构成三个时段的知青文学。它们因其时代因素和作家构成的不同，文学状态和性质也相应略有差异。

但是，从总体上言，知青文学，在深秋的中年人生里，我们仍然读不到超然的悲悯；在惆怅的日落时分，仍然无缘领受一份穿透历史真相的深邃目光；在追忆中，那种刮骨疗伤的忏悔，仍然

海南的知青文学应该得到高度评价，同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。洪三泰的诗《寄自黎母山》，张粤来的《红土歌》和冯麟煌的诗。孔捷生的《在小河那边》、《南方的岸》和《大林莽》等小说，包括海南建省之时进岛的老牌知青作家韩少功的《西望茅草地》、晓剑的《世界》等一系列知青小说，都应该成为海南知青文学的重要部分。海南的文学史家们，对海南知青文学缺失一种切近的敏锐近乎麻木。目前广东本土有出息的作家，几乎皆出于海南。就其作品而言，诸如：电影《椰林曲》、《南岛风云》、《碧海丹心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特殊任务》、《西沙儿女》、《海外赤子》。诗歌、散文、长篇小说，更不胜其数。还有一些牵涉全国的重大文学事件，也发生或与海南有关，这些都被忽略了。将海南文学史目光，仅停留在建省之后，实在是狭隘。

海南的知青文学走势，其实是与中国的知青文学同出一脉且同步前行的。看不到这一点，正是一种自我遗忘的病症。